

上海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系列报告

周振华 肖林 权衡 等 / 著

风险防范与 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分析
2016—2017



2016—2017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Y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系列报告

周振华 肖林 权衡 等 / 著

风险防范与 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分析
2016—2017

2016—2017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Y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防范与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分析:2016—2017/
周振华等著.—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32-2752-1

I. ①风… II. ①周…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分析-
2016-2017 IV. ①F1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527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风险防范与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分析 2016—2017

周振华 肖林 权衡 等著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5
插页 3
字数 280,000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752-1/F·1028

定价:68.00 元

前 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40个年头。回首凝眸，筚路蓝缕，逸态横生；抬首远瞻，椎轮大辂，大成有望。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发展的实践和经验，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也面对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即针对新的形势、新的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成果，作出我们的新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站在中国学者独特的地位上，对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其面临的各种问题作出全面、系统而客观的理论与经验实证的分析，揭示改革与发展的内要规律性要求，比较准确地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为社会各界的经济决策及其科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组织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共同撰写《中国经济分析》系列研究报告，就是我们在这种历史要求下尝试作出努力的一种方式。

《中国经济分析》系列研究报告至今已经出版了17册。从1992年始，我们已陆续出版了《走向市场》(1978—1993)、《企业改制》(1994)、《地区发展》(1995)、《增长转型》(1996)、《结构调整》(1997—1998)、《金融改造》(1999)、《挑战过剩》(2000)、《收入分配》(2001—2002)、《政府选择》(2004—2005)、《外部冲击与经济波动》(2008—2009)、《经济复苏与战略调整》(2009—2010)、《复苏调整中的双重压力：预防滞胀》(2010—2011)、《危机中的增长转型：新格局与新路径》(2011—2012)、《新机遇·新风险·新选择》(2012—2013)、《新改革·新开放·新红利》(2013—2014)、《走向新常态的战略布局：新增长、新结构、新动力》(2014—2015)、《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创新》(2015—2016)。2016—2017年度《中国经济分析》主题为“风险防范与经济转型”，深入分析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以及世界经济存在逆全球化风险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防范潜在风险，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其撰写仍按原有风格，保持这一系列研究报告的特点：

1. 着重对与整个国民经济有关的全局性、宏观性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每一辑《中国经济分析》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但对每一个主题都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角度加以考察；若集中论述某一部门或经济某一方面的发展，也是从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整个经济与这一部门的关系方面加以分析。

2. 侧重于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体制因素和体制变革问题的分析，并通过对这一分析来进一步阐述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等。我们相信，即使在目前阶段，体制机制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更为基本的、决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因素。因此，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首先能为中国正在继续深化着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

3. 以对事实的实证分析为主，主要是向人们提供对引起经济问题的各种原因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解释，而不是以“政策建议”为取向。尽管我们也会中问题分析中引出一些“政策含义”，并就一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但基本上也只是一种“思路”，而不是技术上的具体化的政策设计。我们认为，学者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分析”和提供“思路”，为实际工作者（包括政府决策者和公司决策者）提供参考；后者利用这些“分析”和“思路”，结合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和当时各自面临的各种（利益）矛盾，才能最终作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具体对策。

4. 为社会各界提供客观而独立的分析，而不仅仅是一种现行政策的“解读”。由于政府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因此我们关于宏观经济问题、体制变革问题的分析，将首先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所利用。但是，第一，由于我们并不把“政府”本身看成理论上的那种超越一切利益矛

盾、只是为最大化“社会福利”而工作的“社会计划者”，因此我们把政府也作为一个特殊的、外在的分析对象，研究政府行为本身以及政府行为中所体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供社会各界参考。第二，由于我们是站在学者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可能较少考察更多的现实约束条件，一些对策思路和政策建议也许并不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第三，本书只是学者的分析，而不代表政府及其机构的观点。

由于每一辑《中国经济分析》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因此根据不同主题所涉及的专业要求，其撰写者时有变动，但每部书的基调和风格是一致的，整套丛书是前后连贯的。而且，每一部专著都会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有更深入的分析 and 新的发挥。最新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无论在分析方法还是研究深度上都会有一些进步。希望读者给予支持和帮助，我们会继续努力，把《中国经济分析》越搞越好。

0 导论 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与增长新趋势 / 001

- 0.1 世界经济发展正在陷入增长“悖论” / 001
- 0.2 悖论之谜：世界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困境 / 007
- 0.3 2017 年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和变量 / 011
- 0.4 2017 年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 / 021
- 0.5 中国新发展理念引领世界经济走向新发展周期 / 030

1 经济全球化逆行风险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 033

- 1.1 经济全球化存在逆行风险 / 033
- 1.2 本轮经济全球化逆行原因 / 036
- 1.3 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判断 / 040
- 1.4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 / 043

2 外汇储备下降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风险应对 / 047

- 2.1 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现状及其成因 / 047
- 2.2 外汇储备下降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关联 / 054
- 2.3 人民币贬值风险应对策略 / 058

3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路径、风险评估与供给侧改革 / 064

- 3.1 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驱动力 / 064
- 3.2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基本格局 / 067
- 3.3 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评估 / 074
- 3.4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供给侧改革 / 079

4 房地产市场风险防范及稳定发展 / 083

4.1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的基本认识 / 083

4.2 中国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的成因 / 093

4.3 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对策建议 / 109

5 新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与政策应对 / 120

5.1 新经济与经济的新动力 / 120

5.2 中国新经济发展现状 / 123

5.3 转型时期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 / 138

5.4 中国新经济发展的风险防范与政策应对 / 151

6 僵尸企业的治理与振兴实体经济 / 159

6.1 僵尸企业的识别与特征 / 159

6.2 僵尸企业的形成与危害和风险 / 169

6.3 僵尸企业治理的国际经验 / 172

6.4 处置僵尸企业的政策建议 / 177

7 经济增长中区域分化加剧与“东北现象”和“西南现象” / 184

7.1 分化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新格局与新态势 / 184

7.2 急转直下：“东北现象”的症结表现与困局成因 / 193

7.3 逆势而上：“西南现象”的特征表现与成因解构 / 205

8 “双创战略”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 / 214

8.1 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风险 / 214

8.2 中国供给侧增长动力分析 / 215

8.3 创新的内在机制 / 219

8.4 “双创”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 224

9 城乡协调发展与收入分配改革 / 232

9.1 城乡协调发展：理论、目标与争论 / 232

9.2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与协调发展的风险与问题 / 236

9.3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分配格局演变 / 242

9.4 促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 248

10 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收益分析 / 252

10.1 中国对外投资进入新阶段 / 252

10.2 对外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 / 257

10.3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风险 / 262

11 贸易增长下行压力及其有效对策 / 268

11.1 2016 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回顾 / 268

11.2 2017 年提升贸易增长率的对策 / 274

参考文献 / 284

后记 / 286

0 导论 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与增长新趋势

2008 年金融轮危机以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危机后的复苏时间长达 8 年,至今仍未真正走出危机,复苏增长步履维艰,且危机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不仅出现全球增长持续低迷,而且贸易增速出现下降,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全球经济增长表现“平庸不断”;不仅如此,各种“黑天鹅事件”不断上演,欧洲经济、美国经济、日本经济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不确定性增多,金融市场、汇率波动等也不断加大,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0.1 世界经济发展正在陷入增长“悖论”

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逆周期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试图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积极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但是,总体而言,世界经济在漫长的复苏中,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是也出现了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复苏增长出现明显分化,突出表现为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明显分化。在发达经济内部,除了美国等出现积极复苏的信号之外,欧洲、日本等经济增长总体仍然低迷,即使在欧洲内部,经济复苏也出现了分化,除了德国经济复苏较为积极,其他欧洲经济体内部复苏同样缓慢;发展中经济和新兴市场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除了印度、中国等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和新常态以外,俄罗斯、巴西、土耳其以及东南亚国家等经济复苏依旧缓慢;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出现分化,全球性政策协调和集体行动的难度加大,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已经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政策逐渐进入常规性轨道;但欧洲央行、日本等国家则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甚至出现负利率货币政策。这样的背景

下，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缺乏一致性和集体行动的动力，宏观政策的分化在客观上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反而加大了复苏增长的不确定性。二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似乎正在出现“低增长循环陷阱”的特征。即在复苏增长过程中，由于持续低迷增长，导致世界经济从危机刚刚发生以后的“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物价—低收入”和“高失业”逐渐演变成为“危机—衰退”引致的“低增长—低利率—低物价—低回报—低投资—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机制下，世界经济普遍出现了“低贸易增长”“低资本流动性”和“低物价”的“三低”现象。根据世界银行分析，世界经济除了2008年以后大规模刺激带来V字形的短期反弹，从2010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长就进入持续低迷的状态，至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以前10年的平均4.5%的增长速度。目前维持在2.5%左右。世界银行预计2016年与2017年分别是2.9%和3.1%。但是在2016年的6月8日则进一步把世界经济增长下调到2.4%。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则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约为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不振，同时也下调了其年初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不仅如此，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贸易增速，也是连续四年出现下降，并低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目前估计只有2%左右增速。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性趋缓，国际投资增长放慢，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美元加息预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流动性的波动。三是地缘政治因素、大国选举及其政策变动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乃至全球化新格局。恐怖主义、欧洲难民问题、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问题、英国脱欧乃至特朗普新政等都对全球经济发展、资本流动的安全性、能源市场、欧洲一体化以及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深刻冲击，世界经济也因为这些非经济因素和大国关系问题更是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更加扑朔迷离，令各方感到纠结和焦虑。

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和低迷增长的过程中，似乎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了一些“悖论”：

一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持续低增长的悖论。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反危机的调节和刺激政策，普遍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包括像美国先后实施四轮量宽政策、日本安倍经济学大规模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实行零利

率等。从表 0.1 可以看出,世界主要经济体广义货币占 GDP 的比重都保持了上升态势,其中全球平均占比从 2007 年的 98.81% 上升到 2015 年的 124.07%。但是与此同时,全球以及欧洲、日本等国家的 GDP 复苏与增长并未出现明显上升,除了 2009 年大投资带来较短的反弹以后,其余时间 GDP 增速基本上出现明显放慢,除了美国因为复苏较为强劲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外,其余主要经济体仍然保持量化宽松政策取向,有些国家甚至运用负利率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从经济学分析来说,短期内经济衰退和萧条,应该采用逆周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推动经济走出复苏和新的一个繁荣周期。但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宽松货币政策正在出现背离,即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 GDP 增长却仍然保持低迷和增速趋缓的态势,出现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低速”的悖论(具体见表 0.1)。世界经济增长发生了与以往低利率引致高投资、货币刺激引致经济增长不同的新情况,利率水平不断降低,投资意愿却在不断下降,即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范式似乎正在失效,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是全球高债务与低消费的悖论。全球经济增长出现的第二个悖论就是一方面危机以来全球债务水平不断高企,另一方面消费水平稳中趋缓、贸易增长出现下降。从 2008 年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债务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从危机前的 72% 上升到 104%,英国从 44% 上升到 89%,美国从 64% 上升到 105%,日本从 147% 上升到 248%。需要指出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性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债务性质不太一样,前者的债务水平更多用于养老等社会支出和促进消费水平上,因此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主要是“高债务—高消费”模式。但是,危机发生以来,这种不断高企的债务水平并没有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各国内需稳中有降,由此导致全球进口需求增长乏力。2012—2013 年全球贸易量增速连续两年低于经济增速,这与国际金融危机前 5 年贸易量快于 GDP 增速 1 倍形成强烈反差。因此,世界经济进入了低利率背景下的高债务和低需求、低贸易增长并存的悖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普遍是高债务、高消费,全球贸易高增长的确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但目前的世界经济似乎在背离这个常态,进入了高债务和低消费、低贸易的“非常态”。这同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表 0.1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广义货币 / GDP 及 GDP 增长率 (%)

地区 / 国家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全 球	广义货币 / GDP	98.81	102.77	114.10	110.89	112.37	115.14	115.98	118.74	124.70
	GDP 增长速度	4.31	1.84	-1.68	4.35	3.13	2.48	2.40	2.63	2.47
中 国	广义货币 / GDP	150.53	150.01	176.55	177.51	175.90	182.38	188.18	193.17	205.74
	GDP 增长速度	14.19	9.62	9.23	10.63	9.48	7.75	7.68	7.27	6.90
英 国	广义货币 / GDP	144.69	166.49	170.17	169.02	155.17	152.07	149.03	138.67	137.82
	GDP 增长速度	2.59	-0.47	-4.19	1.54	1.97	1.18	2.16	2.85	2.33
印 度	广义货币 / GDP	71.00	75.78	77.72	76.19	78.84	76.86	77.91	77.77	79.19
	GDP 增长速度	8.61	3.89	8.48	10.26	6.64	5.62	6.64	7.24	7.57
日 本	广义货币 / GDP	202.81	209.08	227.02	225.46	237.43	240.70	247.18	250.48	251.92
	GDP 增长速度	2.19	-1.04	-5.53	4.71	-0.45	1.74	1.36	-0.03	0.47
俄罗斯	广义货币 / GDP	42.82	39.43	49.21	51.38	48.17	48.15	52.48	55.21	63.76
	GDP 增长速度	8.54	5.25	-7.82	4.50	4.26	3.52	1.28	0.71	-3.73
美 国	广义货币 / GDP	79.46	84.55	91.06	85.33	87.78	88.45	89.50	90.33	90.32
	GDP 增长速度	1.78	-0.29	-2.78	2.53	1.60	2.22	1.49	2.43	2.4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

三是科技、自动化创新与充分就业悖论。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增长长期待科技创新和新产业革命。毫无疑问，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各国都希望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全球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目前的技术创新似乎更加强调智能化、自动化的新趋势，如德国提出的“智能制造”“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等；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确实正在改造传统的工业化流程和服务经济模式，全球技术进步出现了快速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实体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如何缓解危机以来实体经济下降、失业率上升和就业增长的压力和困难。传统宏观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类宏观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充分就业，这被视为政府制定政策、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正在深刻影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和就业方式。世界经济似乎走在了一个充分就业与技术创新发展的十字路口。因为无论如何，技术创新尤其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客观上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我们必须在自动化、智能制造与充分就业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实际上，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就是抓住“如何解决美国高失业率”这个问题，通过提出所谓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等一系列主张而获得大胜。但实际上，美国的高失业率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因素，更多则是由于技术进步、互联网、自动化、智能化等结果造成的，并非完全是因为制造业转移所致。人们面对充分就业与技术创新的选择，能否找到一个具有“中性”的技术进步呢？这同样是今天世界经济增长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四是实体经济“冷”与虚拟经济“热”的悖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进一步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的趋势和问题。2008年以来危机发生的导火线就是虚拟经济过热，特别是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金融领域发生危机并迅速扩大到全球，多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中积累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最终因为高杠杆、高债务和高风险导致危机与衰退。危机发生以后，原本虚弱的实体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至今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状态，实体经济投资成本上升，投资意愿进一步下降，全球性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速度放慢，各国实体经济普遍不景气。与此同时，虚拟经济则进

一步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自我循环，各国杠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特别是旨在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随着降准降息而刺激实体经济的投资，反而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得虚拟经济更加过热，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度出现短时期股市泡沫甚至股灾、房市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经济学研究同样表明，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中的“IS-LM”模型总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背后的逻辑则是通过利率—投资—需求—增长—就业—物价—收入等相互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理论本身表明虚拟经济发展始终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却出现了实体经济“过冷”与虚拟经济“过热”的悖论。人们不禁要思考，全球经济的金融化意味着什么？金融化与全球化交织发展，无疑增加了我们对全球经济分析的难度。

五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悖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确实也在反思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反思和争议莫过于对全球化机制的思考。特别是局部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因为全球化使得许多国家被卷入，遭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影响。但是，人们也始终坚信，全球化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是发展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潮流，无论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还是全球化的参与者，都分享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近两年来，由于全球经济长期衰退和缓慢复苏，贸易增速下降，各国纷纷竞相扩大出口，保护进口，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纷纷抬头。一般而言，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常态性”选择，况且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从来都存在。但是，问题在于最近一年来全球经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其一是英国脱欧对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作为欧洲复杂地缘政治关系问题的产物，英国脱欧本身是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沉重打击，是一种典型的逆全球化现象和态势。其二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政策主张。人们热衷于美国新总统的当选，显然在于“特朗普新政”中流露的甚至包含的一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潮。这样的思潮背后隐含了一种令人忧虑的民粹主义、极端保护主义的倾向。显然这与全球化趋势、开放发展与自由贸易相背而行。由此所谓的“反全球化”“全球化终结论”等似乎掷地有声。世界经济走到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由市场化力量主导的全球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进而形成的全球资本流动、全球自由贸易、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深化及合作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也确实出现了民粹主义倾向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现象。无论如何,逆全球化现象既不符合世界经济实践的实践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全球化从来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全球化当前困局发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全球化发展的本身,而是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甚至长期衰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且因为全球化机制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放大。显然,逆全球化思潮已经困扰了世界经济发展。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0.2 悖论之谜:世界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困境

如何理解和思考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困境?从现有的讨论来看,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全球性产出下降,消费下降,进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总体世界经济增长进入通缩和停滞状态。这种观点在危机刚刚发生后几乎占据主流认识。但是,问题在于从应对危机的反周期政策效果来说,本轮全球经济衰退甚至“长期停滞”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机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推动下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化机制需要反思和完善,特别是需要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出发寻找世界经济解困之谜。第三种看法则是在最近一两年,人们逐渐形成的一个较为主流的想法和判断,即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困境,所以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初步共识之一。这一点也从2016年G20峰会达成的共识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何为全球性结构性困境?最为根本性的制约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是哪些?为什么世界经济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周期性规律有何关系?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选择合适的全球经济治理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的判断是,进入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的确成为影响和制约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根本性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全球产能过剩困境和总量失衡制约了复苏与增长。世界经济在上一

轮科技革命、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全球技术效率驱动和全球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了世界经济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快速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提高了全球性的产能水平；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以及服务经济发展的兴起，全球对制造业产能需求下降，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供求总量失衡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就已经出现，只是危机冲击进一步造成需求收缩，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行业发展严重亏损。而在这之后，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量化宽松政策，其实施的结果则是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大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扭曲问题。而如何缓解目前的供需总量失衡，缓解全球性产能过剩，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则是亟待全球性合作与集体行动推动结构性改革。否则，仅仅依靠政策并把重点放在应对危机上，只能使总量失衡问题更加严重，长期内经济增长更加低迷。

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供需结构不匹配加剧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世界经济除了发达国家强劲增长的引领以外，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也是世界经济维持高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了近 20 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也已经进入了结构性改革和调整的新阶段。特别是随着经济总量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转型，全球范围内“恩格尔系数”趋于下降，消费结构升级转型中，对服务型经济的需求不断提高，高品质、个性化、服务化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主流，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供给函数、生产模式与需求函数、需求结构不匹配。供需结构性不匹配严重制约世界经济新增长和新创新。所以，从全球经济供求关系来看，目前不仅在供求总量上出现困境，而且在供求结构上也出现了困境；并且供需总量失衡与结构性失衡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总体性结构困境和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供给端出现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和问题。

三是全球发展结构不平衡与收入不平等困境制约了增长和复苏。全球性消费增长低迷，不仅是金融危机冲击所致，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日益加剧。根据皮凯蒂在其《21 世纪资本论》中的论述，